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 谢帕德 Eugene R. Sheppard ● 著

# 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

——一个政治哲人的锻成

Leo Strauss and the Politics of Exile: 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Philosopher

高山奎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施特劳集

刘小枫 ● 主编



# 施特劳与流亡政治学

Leo Strauss and the Politics of Exile:  
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Philosopher

[美] 谢帕德 Eugene R. Sheppard | 著

高山奎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一个政治哲人的锻成/(美)谢帕德著;高山奎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3. 9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7737-6

I. ①施… II. ①谢… ②高… III. ①施特劳斯, L. (1899~1973) —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B712.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7178号

## 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

---

作者 (美) 谢帕德

译者 高山奎

责任编辑 孙颖

责任印制 刘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次 2013年9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25

字数 241千字

定价 39.00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中译本前言

从传记角度审视一位思想家，人们往往在青年时期与成熟时期之间做出划分，因为，伟大哲人的一生是自我俭省、自我超越的一生。谢帕德（Eugene Sheppard）的《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一个政治哲人的锻成》（*Leo Strauss and the Politics of Exile: 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Philosopher*，以下简称《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就将施特劳斯的思想发展划分为这样两个时期。作者认为，“迈尔过分偏重施特劳斯成熟时期著作的教条主义，大大削弱了他对早期施特劳斯令人激赏的研究成果。成熟时期施特劳斯著作的特点是，过分武断地强调对相反范畴的紧张对抗，如耶路撒冷与雅典、启示与理性、古代人与现代人，而迈尔通过解释、调和这些对立概念，来理解施特劳斯的工作及其思想遗产”（《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本书引言，页7，下同）。与此相反，谢帕德强调自己的研究“追随施特劳斯思想的发展一直到1948年，集中研究古内尔（John Gunnell）先生所恰切提及的‘施特劳斯主义之前的施特劳斯’（Strauss before Straussianism）阶段”（《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引言，页8—9）。

谢帕德对施特劳斯思想历程的二分法让人很容易想到布鲁姆（Allan Bloom）的三阶段划分。在广受赞誉的《纪念施特劳斯》一文中，布鲁姆将施特劳斯思想发展分为“前施特劳斯的施特劳斯”、“隐微写作主导”时期和“像作者理解自己那样理解他们”的经典解释学时期三个阶段。在布鲁姆看来，这三阶段之间连续且不断深化，“施特劳斯的早期作品受到赞誉，它们被看作是某位古怪兴趣的人的学术创造。第二阶段的作品被认为是荒谬的，它

们激起了怨愤。第三阶段的作品被忽略了……但这些书是真实、伟大的施特劳斯，与它们相比，其余的只是序言”（《巨人与侏儒》，华夏出版社，2007 修订版，页 13-16）。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谢帕德与布鲁姆眼中的施特劳斯针锋相对：前者看重的是“施特劳斯主义之前的施特劳斯”的激情恣意，而后者则强调施特劳斯主义时期的曲径通幽。

施特劳斯后期思想固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谢帕德的学术探究似乎更贴近施特劳斯的原初意图。一方面，作为一个德裔犹太流亡哲人，施特劳斯拒斥纳粹极权主义的正当性，这最突出的表现在对“多层次写作的探究”上：“施特劳斯不仅描述了一种被遗忘的阅读和写作艺术，而且，在自己出版的专著中，他也开始尝试践行这些技艺。施特劳斯已经开始考虑将显白写作视为自己着手评注、诠释和学术贡献的一种方法手段”（《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页 199）。但究其根本，对犹太人流亡境遇的关注、对神学—政治困境的省思、对“魏玛自由主义挥之不去的反感”作为施特劳斯思想的底色一直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只不过在他到达美国后，为了适应寄居国的新环境，这一隐秘关切变得更加韬光养晦而已。因此，不能由于表述形式和具体论题上的变化而对施特劳斯更加显白的早期思想加以贬低。相反，只有重视、理解施特劳斯早期的学术思考和理论关切，才能透彻理解施特劳斯的理论热情为何如此专注地深入到西方学术的理论原初和深层脉动。对于生长于自由民主背景下的美国学子而言，他们很难体悟一个边缘者、流亡者的彻骨之痛。更何况（第二方面），正如谢帕德所展示的，他们接触到的施特劳斯早期文献也颇为有限。“随着施特劳斯美国事业的展开，他作品中那些最让人困惑的方面开始变得有意为之。如果接受这一论点，那么施特劳斯思想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故意留下足够的线索以引发敏锐、细心的读者的怀疑，同时避免引起普通、粗心的读者的注意。由此出发，施特劳斯坚决地试图抹除或隐藏自己对其时代重大问题所持的真

实立场的所有确凿证据的做法，就显得不足为奇。这种模糊处理或可解释笔者在本章中所考察的一些文章和讲演（〔译按〕指早期作品）为什么在施特劳斯后期出版的文集中未能收录再版，甚至被列为禁止出版作品的原因之一：它们或许暴露了太多施特劳斯的真实观点”（《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页205）。可见，正是由于文献的匮乏和体悟的缺失，布鲁姆对施特劳斯思想重要性的体悟发生了天平上的倾斜。

问题是，同样的流亡背景，相似的社会局外人的体验，并不必然走向右的激进保守主义，抑或走向左的社会批判学说（如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左翼学者们）。那为何独独施特劳斯既没有走向右派的保守回归，也没有像西马左派人物那样本着无畏的理智真诚岿然前行（参见施特劳斯，《摆脱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偏见》，载于《美国政治学评论》，卷57，1963，第6期，页151-160）。这或许有性情气质方面的原因，但更直接地源于思想统绪上的传承。在1960年的一封致索勒姆的信中，在赞扬索勒姆在“聪明才智方面为其他犹太人照亮了家园”，从而成为“一个对现在活着的每个犹太人的祈福者”之后，施特劳斯写道，“我从气质上便不可能追随你——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我也曾郑重表示恪守一个信念，恪守现在的信念的誓言……：moriatur anima mea mortem philosophorum〔我的灵魂一朝死去，也如众哲人之死〕”（《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华夏出版社，2006，页397-398）。

不妨再举一个间接的例子，伽达默尔在一次访谈中描述了与施特劳斯初次会面时的印记：“我特别记得他有趣的样子：隐秘的、怀疑的、讽刺的和总是不无愉快的。……他肯定在我身上觉察到一个因为成功而自豪的青年学生的盛气。知道他如此敏感，我在这之后非常小心地不冒犯他”（《访谈：伽达默尔论施特劳斯》，载于《回归古典政治哲学》，页486）。上面两个例子，前者说明了施特劳斯为何没有成为宗教信徒而是一位哲人，后者则间接证明了施特劳斯内敛持重的谨慎性格。这些个体心性和性格气

质方面的因素是施特劳斯没有成为宗教信徒（如索勒姆）和锋芒外露的社会批判者（左翼学者）的潜在原因。

与性格气质上的因素相比，柯亨、尼采的思想影响，以及犹太学术机构的研究经历等因素直接促使了施特劳斯远离左翼的社会批判。作为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创始人，柯亨的犹太思想成为引领施特劳斯学术思考的向标。“虽然施特劳斯足够成熟地拒绝了柯亨诠释学中的几个核心方面，但是他的许多重要洞见却是在对这些诠释（甚至是错误诠释）的理解和论辩中产生的”（《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页14）。借由柯亨，施特劳斯重估斯宾诺莎的意义，回溯到迈蒙尼德的中古犹太哲学，最终抵达柏拉图的春秋笔法，从而开掘出一套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而尼采对平等主义的挞伐和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愿景的末人批判，则成为施特劳斯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基石，因此，经历柯亨和尼采思想洗礼的施特劳斯，再也无法从自由主义内部，像那些“半吊子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通过零敲碎打的批判修补工作来挽救自由民主制的西方社会。

可见，无论从思想分期、原初意图，还是理论旨趣方面，要想对施特劳斯思想获得一种恰切的理解和把握，就要对他的流亡处境和生活经历有所了解，在生活与思想的关联中勾勒这位政治哲人的思想肖像。谢帕德的专著——《施特劳斯与流亡政治学》就是进行这样一种谱系学的工作。该论著以时间为经、问题为纬，将施特劳斯早期思想划分为四个时期：（一）反犹太主义与新康德主义时期；（二）魏玛保守主义犹太人时期；（三）流亡欧洲与思想转向时期；（四）迫害与写作的艺术：纽约时期。在这四个时期，自由主义批判和流亡问题两个显著特征反复出现，借助翔实缜密的历史分析和文献梳理，谢帕德展现了青年施特劳斯思想发展的生动画面，为读者描画了一个政治哲人蜿蜒前行的思想地图。

本文的翻译得益于刘小枫先生的信任和委托，先生的学界影响和旗帜意义有目共睹，无需晚辈赘言。因此，接到翻译任务之

初，译者曾为自己有幸加入这支队伍，为翻译志业尽一点个人的绵薄之力而激动莫名。然而，翻译上的苦乐艰辛唯有经历者方能体知。坦率地讲，译者力求在译文的准确上做到无愧于良心，但作为首部译著，它难免带有邯郸学步的痕迹。因此，恳请读者多多批评，以求有机会得到补正。

最后，感谢北京大学唐士其教授对书名翻译的斟酌谏言，感谢妻子刘艳女士在翻译过程中的智识帮助和生活上的担当呵护。感谢父亲高玉泉先生，母亲林风华女士一直以来的默默关爱以及对爱女高佳的倾力帮扶。

高山奎  
彭城牛山寓所  
2012年9月



## 致 谢

本书的出版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同时也是一个筹划、研究和写作的异常艰辛的孤独历程。借此机会，我想向我的家人、朋友、师长和同事表达感激之情，他们为这份努力贡献良多。这项研究任务艰巨异常，眼前这部拙作尚未达到它的原初目标。因此，这部书的优点反映了他们创造性的投入，而它的缺陷则全系笔者自身的原因所致。

这部可争论之专著的早期雏形源自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当时我就读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迈尔斯（David N. Myers）引领我步入犹太史研究领域，尤其是犹太思想史领域。作为我的博士生导师，他给予我许多实现主要学术目标所必需的方法、鼓励和批评。作为导师和朋友，迈尔斯先生帮助我找准位置，尽快融入工作和生活。我要感谢班德（Arnold J. Band）先生，他在语言、文本、学者和作者等方面对我指点颇多。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对知识分子遗产及其角色充满激情的理解，激发我献身于做一名保守主义思想家，即一个比他所意识到的更具广泛影响和争议的人。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ander）的教诲和写作着力于沉思与良知之间的微妙平衡。他坚定不移地献身于对迫害、危机和大灾难时期文明史复杂性的探究和理解，成为我心向往之的学者典范。

曼德斯弗劳（Paul Mendes - Flohr）是另一位在德国犹太思想方面让我感佩的年轻学者和师友。他博大的胸怀与心智将是我整个职业生涯赖以践行的向标。

几位好友和同事以不同方式对本书的部分章节进行了阅读与

评论, 他们有阿诺德 (Kathleen Arnold)、巴特扎卡 (Leora Batnitzky)、柯亨 (Jonathan Cohen)、道登 (Steve Dowden)、恩格尔蒙 (David Engerman)、哥特利布 (Michah Gottlieb)、哈尔伯特 (Moshe Halbertal)、杰伊 (Martin Jay)、卡恩 (Susan Kahn)、莱博维茨 (Nitzan Lebovitz)、梅林 (Sabine von Mering)、迈尔 (Thomas Meyer)、蒙塔格 (Warren Montag)、普劳茨 (John Plotz)、里特尔 (Martin Ritter)、斯塔尔 (David Starr)、怀特菲尔德 (Stephen Whitfield)、樟柯 (Michael Zank) 和兹普斯坦 (Steven Zipperstein)。艾迪 (Moshe Idel)、艾维 (Alfred Ivry)、伯伦纳 (Michael Brenner)、拜勒 (David Biale)、奥特曼 (William Altmann) 和艾伦森 (David Ellenson) 等等, 他们不断激励我从事这项研究。丰波特 (Charlotte Fonrobert) 总是尽力从全新的视角激发我反思法律和文字问题。阿库什 (Alan Arkush) 和雅克 (Benard Yack) 则被证明是施特劳斯话题上极具挑战性的对话者。

戈登 (Peter Gordon)、克莱因伯格 (Ethan Kleinberg) 和莫伊 (Samuel Moyn) 在思想和哲学上不断砥砺我思考, 他们暖暖的关爱使我在冬季的新英格兰如沐春风。布克 (Courtney Booker) 的提问和建议激发我以旅途之人 (Homo viator) 的游历视角构思本书。拉兹-克拉柯茨金 (Amnon Raz - Krakotzkin) 关于犹太史上流亡现象的创造性阐释, 促使我重思过往三千年来政治、宗教和历史相互融贯交织的各种存在方式。

纯属偶然的是, 作为美国犹太流亡学者的弟子, 我在布兰迪斯大学找到了自己的学术阵地 (academic home)。我一直努力聆听卓越学术前辈的声音, 他们的思想饱含时代的创伤经历, 这些强有力地激发我的学术热情。自从来到布兰迪斯大学, 近东犹太研究系 (the department of Near Eastern and Judaic Studies) 可敬的同事们给予我莫大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布瑞特勒 (Marc Brettler)、菲斯曼 (Sylvia Fishman)、弗瑞兹 (Chaeran Freeze)、保罗斯盖 (Antony Polonsky)、莱维德 (Benjamin Ravid)、萨那 (Jona-

than Sarna) 和特洛恩 (Ilan Troen) 一直关心我的研究进展, 他们的共同关照 (collegiality) 使我受益颇多。与戴科特 (Jonathan Decter) 的无数次对谈燃起了我对中古阿拉伯和希伯来文本研究的热情, 尤其对这些著述多层含义的挑战与魅力兴趣日增。布兰迪斯大学图书馆的两位同事, 罗森布鲁姆 (James P. Rosenbloom) 和维尔 (Anthony Vaver), 在我查阅重要文献资源时提供了诸多便利与协助。

我要感谢现代犹太史考瑞特 (Richard Koret) 特聘教授和布兰迪斯大学校长莱茵哈茨 (Jehuda Reinharz) 先生, 作为陶伯研究系列 (Tauber Institute Series) 丛书的主编, 他邀请我提交书稿到丛书编委会。弗莱德 (Sylvia Fuks Fried) 副主编在图书出版的全程对我勉励有加。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道谏茨 (Phyllis Deutsch) 与布莱斯 (Ann Brash) 的精辟评论为本书的修正完善提供了契机。

流亡研究中心之外的友人也应受到感谢。班 - 扎肯 (Avner Ben - Zaken) 和班 - 道尔 (Zvi Ben - dor) 成为我的朋友和兄弟。自研究生阶段便一同在耶路撒冷从事研究的苏菲恩 (Sandy Sufian) 成为我亲密的朋友和同事。赵 (Susan Cho) 是一位值得珍惜的朋友, 我们曾约定共同去追求纯粹的快乐和深刻的辉煌。

我的家人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直勉励着我。在事业发展的每一步, 罗森 (Stan Rosen) 都在背后默默关怀和支持着我。赫蒂 (Hedi) 和萨德 (Ronald Sands) 让我感受到这个特殊大家庭的情义深重。在过去的几年, 我的四个兄长和姐姐——巴利 (Barry)、罗伯特 (Robert)、朱蒂斯 (Judith) 和詹纳 (Jenene) ——与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为了让我安心写作先后远离我而居。然而, 出自本性的亲情和鼓励又使他们不断地亲近和疼爱我。这本书的出版恰逢一个新谢帕德家庭的诞生。在本书写作与编辑出版的最后阶段, 丹娜 (Shira Diner) 进入我的生活, 她的爱的出现使一切都变得如此甜蜜。

在我的生活中，最大的灵感源泉来自我的父母。苏珊娜·谢帕德 (Suzanne Sheppard) 为孩子们提供了尊严生活和高尚人格的鲜活样板，尤其是直面逆境的品格。

作为一种爱的纪念，这本书献给我的父亲——阿尔伯特·谢帕德 (Albert M. Sheppard)。父亲是我最伟大的老师。他进出法庭充满激情的声音，最早燃起我对文字和思想真正威力的敬意。对他珍贵的记忆将继续指导、丰富并照亮我前行。

谢帕德 (Eugene Rosenthal Sheppard)

于马萨诸塞州瓦尔珊

## 引言

[1] 本书旨在揭示作为犹太思想家和政治哲人的施特劳斯的  
思想形成。施特劳斯从德国到美国的旅程，同时也是他竭力理解  
流亡存在及其政治架构，努力挣脱保守魏玛犹太人身份意识，走  
向现代自由主义的思想历程。作为一个来自德国的犹太裔避难者，  
施特劳斯试图解决一个犹太人不愿放弃忠诚于自己的祖辈共同体  
与不愿严格恪守宗教律法生活之间的冲突。施特劳斯一方面将真  
理和智慧视为超越了特殊宗教和民族共同体，另一方面他深知自  
己已完全处于启蒙人文主义的光照之下。因此，他努力在犹太教  
与哲学、古人与现代人、柏林与纽约之间逡巡定位，最终建构起  
复杂且激动人心的思想工程和独创性的解释学成果。

很多学者倾向于将施特劳斯理解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精神奠  
基者。<sup>①</sup> 单从字面上来理解，施特劳斯的这一声誉可追溯至他在  
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作为一个政治哲人，施特劳斯与其他几位  
保守主义同仁一道，疏解思想史上伟大心灵们的经典之作所教诲  
的思想教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反共言论。虽然施特劳  
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从芝加哥大学的教席上退了下来，但他  
的影响依然强劲地支配着这所大学的政治学系和社会思想委员会。

---

<sup>①</sup> 关于这一主题，最近的一部研究专著是 Anne Norton 的《施特劳斯  
与美帝国的政治》( *Leo Strauss and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该书将政治的触角与施特劳斯主义学者、保守  
主义智囊团和政府勾连起来。然而，这部专著公开宣称不探讨施特劳斯本人  
的论题。

施特劳斯学生中的佼佼者，继承了他的哲学和解释学路向的弟子有布鲁姆（Allan Bloom）、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丹豪瑟（Werner Dannhauser）、雅法（Harry Jaffa）、拉勒纳（Ralph Lerner）、马赫迪（Muhsin Mahdi）、莫肯（Aryeh Motzkin）、曼斯菲尔德（Harvey J. Mansfield）、罗森（Stanley Rosen）、塔尔科夫（Narthan Tarcov）等等。然而，这些施派弟子的观点之间，尤其在东海岸施特劳斯学派和西海岸施特劳斯学派之间，存在明显的裂痕，他们都声称自己得体地揭示出了事情的真相，进而宣称自己一方才是施特劳斯思想遗产的真正传人。同时宣称获得施特劳斯思想遗产的还包括新保守主义政治评论家和战略家，如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和贝内特（William Bennett）；政治家如金里奇（Newt Gingrich）；司法界知名人士如博克（Robert Bork）、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和 [2] 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另外，小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在任期间的几家权威国际报纸杂志，被指认为施特劳斯主义发挥影响的温床：从稳健外交政策和防御性政策分析转向强硬派人物如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和伯尔（Richard Perle）的立场。<sup>①</sup> 一些媒体人注意到，小布什任期内一系列观念和政策心照不宣的一致及其调整，全系 2001

---

<sup>①</sup> 参见阿特拉斯（James Atlas）的专栏文章，《一个古典主义者的遗产：新帝国的缔造者》（A Classicist's Legacy: New Empire Builders，载于 *New York Times*，2003 年 5 月 4 日第 4 版，页 1）。在这篇文章中，阿特拉斯绘制了一幅流程图，表明小布什政府高层与施特劳斯之间的关联，这引起评论家的强烈反响。类似的文章发表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世界报》（*Le Monde*）、《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国际先驱论坛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名利场》（*Vanity Fair*）和《国家》（*The Nation*）等报刊杂志。因此，林登·拉洛奇（Lyndon LaRouche）的智库（spiratorial organs）将施特劳斯视为“新保守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教父”（The Fascist Godfather of Neo-Conservatism）就显得不足为奇。弗兰尚（Alain [转下页注]

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的结果。根据这些媒体评论人的观点，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议程的制定，明显受到不适当的施特劳斯主义保卫西方文明免受敌人侵害之观念的影响。

施特劳斯的影响更直接地见于新保守主义的定期刊物《评论》(Commentary)杂志，尤其是《解释》(Interpretation)学刊，后者曾将施特劳斯列为编委。另外，《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的几位主笔和“美国新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高参们，公开将施特劳斯视为给他们保守主义观点带来决定性影响的灵感源泉。里拉(Mark Lilla)最近在《纽约图书评论》(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了关于施特劳斯事业和遗产的两部分评论(two-part assessment)。里拉的划分，在不同部分采用不同的语气，意图突显施特劳斯、欧洲人与这位饱受争议的著名人士之间的巨大裂痕，这一裂痕的出现源于施特劳斯主义对学术界、政府及其智库产生的不同影响。<sup>①</sup>

---

[接上页] Franchon) 和韦尼特(Daniel Vernet)在《世界报》发表的《战略家与哲人》(Le Stratège et le philosophe)使这一观点达到最强音。上述文章大多将矛头指向施特劳斯美国著述时期广泛的中心主题，却未能触及细微而精准的施特劳斯思想肖像，后者源自他的核心思想关切与诸种理论。同样的情形出现在那些自称施特劳斯弟子与后代的反驳论述中。例如，伦兹纳(Steven Lenzner)和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施特劳斯究竟在干什么?》(What was Leo Strauss up to, 载于Public Interest 153, 2003, 页19-40)。在这些辩护性文章中，值得关注的是克雷(Jenny Strauss Clay)——施特劳斯的养女——在《纽约时代》(New York Times)上发表的重要反驳文章——《真实的施特劳斯》(The Real Leo Strauss, 载于New York Times, 2003年6月7日, 页A15)。

① Mark Lilla, 《列奥·施特劳斯：一个欧洲人》(Leo Strauss: The European, 载于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卷51, 第16期, 2004)与《闭塞的施特劳斯心智》(The Closing of the Straussian Mind, 载于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卷51, 第17期, 2004)。单从标题上看，我们很容易察觉到两篇文章的重要不同：第一篇文章是审慎的主题分析，而第二篇文章则明显暗合布鲁姆的《闭塞的美国心智》(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转下页])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施特劳斯弟子们倾向于像施特劳斯看待经典哲学著作那样看待施特劳斯的作品：即将这些著作视为永恒心灵的产物，它们仅向少数未来哲人传达隐微真理。因此，对施特劳斯的解读，施派弟子们往往带有聪明或无聊的圣徒传记（hagiographies）色彩，他们试图借此表明自己与可敬的导师之间拥有无出其右的亲密思想关联。同样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反施特劳斯主义的自由主义捍卫者们接受了上述评价施特劳斯作品的相似观点。他们将施特劳斯的工作看作是创立了一个正统宗派，因此试图揭露其核心教义并驳倒它：例如，德鲁里（Shadia Drury）试图检审早期施特劳斯的德国和犹太思想。但是，由于她相当严苛的施特劳斯阅读基于对施特劳斯犹太背景和写作的有限理解，所以德鲁里的开拓性努力最终归于失败：她无法有效阐明，在危机深重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学习、研究和出版著作的这个来自基希海因的德国犹太人所面临的政治、宗教和历史的具體窘境。<sup>①</sup>事实上，许多施特劳斯主义者和反施特劳斯主义者的研究最终归于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未能在德国—犹太人历史背景和犹太流亡者经验视域下理解施特劳斯的 思想发展。

最近以来，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关注施特劳斯思想的犹太方面。例如，格林（Kenneth Hart Green）的工作促使学者们认识到，虽然施特劳斯的论域触及大量的非犹太思想家和论题，如不考虑其思想的犹太方面，施特劳斯的 思想肖像必定不完整。格林研究施特劳斯的 大部头著作——《犹太人与哲人》（*Jew and Philosopher*），通过阐明施特劳斯三次重返中古犹太哲人迈蒙尼德（Mo-

---

[接上页]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即是说，后者的标题意味着将矛头转向了私人和论辩。

<sup>①</sup> Shadia Drury, 《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Leo Strauss and the American Right*），New York: St. Martin's, 1997。



ses Maimonides) 来勾勒施特劳斯的思想发展。<sup>①</sup> [3] 与英语世界之前的研究不同, 格林的研究强调施特劳斯魏玛时期作品的重要性。在格林贴近原文的研究中, 施特劳斯作为宗教思想家的形象显露出来: 施特劳斯试图发现并模仿迈蒙尼德细致入微地对待哲人和犹太人这一双重身份。这涉及施特劳斯重新发现了传说中的迈蒙尼德的解释学, 这一解释学区分了隐微—显白 (esoteric and exoteric) 两种写作艺术。通过在英语世界收集材料, 格林推进了前期的学术研究成果, 这些材料大多散见于施特劳斯主义者主办的学刊或未刊稿中, 格林将这些材料编在一起, 以“犹太哲学与现代性危机”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为题出版。<sup>②</sup> 这部论文集的优点在于, 它向广大读者展现了施特劳斯犹太写作和演讲的宽广论域, 进一步夯实了施特劳斯作为犹太思想家的理论地位。本人的这部作品受惠于格林的工作, 并试图通过考察施特劳斯的生活经历, 展现施特劳斯犹太思想的具体脉络。

迈尔 (Heinrich Meier) 开辟了另一条不同的研究路向, 他从德国思想文化的背景出发, 对理解施特劳斯作出了重要贡献。迈尔的研究从施米特 (Carl Schmitt) 和施特劳斯的通信入手。这项工作为重新评估施特劳斯与欧洲同时代其他思想家之间的关系铺平了道路, 尤其是对希特勒掌权前后的那段戏剧性时期的研究意义重大。第 1-3 卷 (计划 6 卷) 的施特劳斯文集 (*Gesammelte Schriften*) 的出版为业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可靠的关于施特劳斯

<sup>①</sup> Kenneth Hart Green, 《犹太人与哲人》 (*Jew and Philosopher: The Return to Maimonides in the Jewish Thought of Leo Straus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sup>②</sup> Leo Strauss, 《犹太哲学与现代性危机》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Essays and Lectures in Modern Jewish Thought*), Kenneth Hart Green 编,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